



QILU EVENING NEWS

齐鲁晚报

www.qilwb.com.cn

本报地址

济南泺源大街2号

邮编

250014

传真 (0531)

86993336 86991208

报纸发行 (0531)

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 (0531)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

差错投诉

96706

发行投诉 (0531)

85196528

邮政投递投诉

11185

即时互动平台



“壹点”官方APP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ilwb



齐鲁晚报微信  
qilwanbao002

# 对付“谋财不害命”更得上点心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冒牌货本身“不存在安全风险”,监管者很容易自我放松——反正也出不了大事,又何必费心费力?万一事情被曝光,用“产品无副作用”这句大实话搪塞过去就算了。



评论员观察

针对近日媒体报道的上海公安部门破获1.7万罐冒牌婴儿奶粉案,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责成上海市食药局向有关公安部门了解案件情况,并协助公安机关追查涉案冒牌产品流向,控制风险。经初步了解,上海公安部门已经对查获的假冒奶粉进行了产品检验,产品符合国家标准,不存在安全风险。

换句话说,这些奶粉本身是合格的,并非有毒有害,如果不是检

机关以工作动态的形式公布这起案件,那些给宝宝们喂下冒牌奶粉的父母,极有可能永远不会获知真相。尽管“不存在安全风险”,但还是有一个问题令人心忧,如果更多“聪明”的不法分子学会了“谋财不害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得到保障呢?

按照官方通报的信息,灌装在名牌奶粉罐子里的是低档、廉价奶粉,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不同档次奶粉间的差价赚取利润。看来,他们也学聪明了,吃透了家长们“给孩子最好的”这种心理,还不用担心因为奶粉质量问题露出马脚。这就好比用普通蔬菜冒充有机蔬菜,吃不死人,也吃不出毛病。那些不具备专业知识也不可能置办专业检测设备的普

通消费者,不知不觉中就中了这种“谋财不害命”的圈套。

也正因为“谋财不害命”,对于那些高价低质的冒牌货,要想发现很难,监管起来难度就更大。回想有关奶制品的著名的“三聚氰胺事件”,以及“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其曝光都是因为产品本身安全性存在问题,导致不少孩子病变,这才引起重视。相比之下,这次冒充名牌婴儿奶粉的,的确确都是合格的产品,官方的检测也证实“不存在安全风险”。

按理说,既然魔高一尺,道就得再高一丈,狐狸变狡猾了,猎手就要更聪明些。不法分子学会了“谋财不害命”的招数,监管部门相应地也得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就拿奶粉来说,不具备精准甄别奶粉

档次的能力,对其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的监管形成不了“闭环”,就等于对冒牌货的放任。而监管越是落后,不法分子就越是疯狂,相关领域很可能陷入混乱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冒牌货本身“不存在安全风险”,监管者很容易自我放松——反正也出不了大事,又何必费心费力?万一事情被曝光,用“产品无副作用”这句大实话搪塞过去算了。在这样的心态之下,那些市场高度开放的领域,或许通过自净也能逐渐地解决问题,顶多让消费者花点冤枉钱,但眼下在医疗等领域,因为财政资金的紧张,还有部分公共产品是交给市场的,一旦消费者的信心丧失了,很可能会给社会生活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 厚葬积习催生“职业哭丧”

一家之言

杨朝清

金桂花(化名)是四川成都市一名职业哭丧人,已经从事这一行业19年;找她哭丧的人,多是来自农村或郊区。“以前做这行的人少,找我的人自然多;现在做这行的人越来越多,竞争很激烈。”(4月4日《华西都市报》)

作为一个重要的生命仪式,葬礼具有的公开性和象征意义,使其成为一种社会表现和社会竞争的舞台。在一个具有悠久农业生产历史的国家里,人们在进行殡葬消费的时候,不仅从经济层面进行计算,还必须从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上进行权衡。在殡葬上的支出,很多时候成为一个家庭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成为衡量家人是否孝顺的重要依据。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多元化的当下,面对“职业哭丧”,人们难免会存在价值分歧和观念冲突。赞成者认为,葬礼是一个情感表达的场合,“职业哭丧”有助于将葬礼的悲伤气氛推向高潮;反对者觉得,“职业哭丧”只是一种虚情假意的商业表演,是对传统孝道的玷污和伤害。

从本质上看,“职业哭丧”是“文化堕距”的产物。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认为,急剧的社会变迁,会导致物质文化和非物质的适应性文化在变迁速度上发生时差;

在物质生活渐次丰盈的当下,一些人的精神家园建设却“慢一拍”。在“厚养薄葬”得到越来越多文化认同的今天,那种在葬礼上聘请“职业哭丧”的做法,显然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农村和郊区的一些人家之所以热衷聘请“职业哭丧”,就在于存在着一种区域性、地方性的“殡葬文化”。那种将“哭丧”和“孝心、孝顺”进行挂钩的做法,为“职业哭丧”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不论是“比别人强一些”的攀比心理,还是“别人都如此”的从众心态,“职业哭丧”的背后,隐伏着复杂的利益考量和心理纠葛。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饭局闲话、街角传闻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让一些人对新生事物保持一种谨小慎微的态度。那种“葬礼越热闹越好,哭丧越动情越好”的价值错乱,自然会催生“表演性哭丧”的上演。子女亲属的亲历而为也好,“职业哭丧”的市场化交易也罢,都是为了赢得“孝顺、混得好”等社会认同。

“职业哭丧”固然能够带来葬礼现场的“好效果”,却未必能做到“厚养薄葬”的真孝顺。走出“文化堕距”,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重塑和更新,提升全社会对“厚养薄葬”的价值追求,才能真正做到“让生如夏花般灿烂,让死如秋叶般静美”。到那个时候,即使没有哭丧,也无损人们对逝者的思念与缅怀。

媒体视点

## 推动绿色殡葬,要坚定也要温柔

今年清明期间,“公墓使用年限是否20年”、“骨灰变‘宝石’,上海引入殡葬新形式”两则消息,再次引发网民热议,凸显殡葬话题社会关切度不减。

逝者如何安葬,于家于国都是大事。一块墓地、几挂鞭炮,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一般来说是逝者“入土为安”,生者“凭吊有物”的必要。但在人口基数达13亿之多的中国,厚葬则必然导致土地大量被占用,使用不可降解材料则会使环境被破坏。可用土地的有限、生态环境退化与墓位面积超标、过度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等已成显性冲突。为保生态、惠子孙,推动殡葬向绿色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非改不可。

推动殡葬向绿色转型,需要公众心理和殡葬机制的双重“破障”,而且必须细心温柔地推动,不能来粗的。今年2月,民政部等9部委已联合印发《关于推行节地

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明确采取鼓励、引导的方式推进。也只有认真落实有关规定,杜绝粗暴行政,才能赢得公众的理解和配合。

下一步,还需要各地结合实际尽出台奖励、规范等细则,尤其是实实在在提高绿色殡葬的服务供给能力。这就要求严格落实安葬服务标准,优化服务流程,拓展服务项目,强化人文关怀,为公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绿色殡葬公共服务产品。如此,“死不起”的焦虑方可消除。

需要明确的是,推动殡葬向绿色转型非朝夕可成,再好的设想,也离不开各方的共识和努力。有关方面一定要充分考虑公众意愿、尊重区域习俗,强化正向激励引导,逐步推动,切忌“一刀切”和“运动式”。(据新华社4月4日电,作者陈文广)

本版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

## 报销纸尿裤的贪官何以得逞

王石川

“大到家具、电器,小到孙女的奶粉、纸尿裤,甚至一双袜子,‘衣食住行’样样都在公款报销。”据调查组人员介绍,彭应龙的贪婪令人听闻,毫无下限。湖南省衡阳县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彭应龙任职期间,违规公款报销个人费用114万余元、收受贿赂180余万元、贪污公款130余万元。日前,湖南省衡阳县政协全体班子成员,学习讨论衡阳市纪委对彭应龙违纪问题的通报。(4月4日中新网)

连纸尿裤、袜子都报销,这名官员确实够贪婪。与其他官员小打小闹、蚂蚁搬家式的报销相比,彭应龙是胃口极大,从新房的装修材料、家具、电器,到个人生活用品,甚至连个人的党费等等,都要报销,确实太无底线了。

与报销金额高相比,最该追问的是,彭应龙为何能够得逞?早在2003年,中央纪委就下发通知,明确规定“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财务收支管理,加强财务监管,严格报销程序,规范报销凭证”。要报销,总得有真实合法的原始凭证吧?彭应龙不可能直接拿购买纸尿裤的发票去报销吧?

对此,新华社曾做过报道,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其实他们很多时

候都是把各类费用报销成了办公用品,这层窗户纸大家都不愿意捅破。可问题是,按照预算制度,采购物品必须有申请吧;应纳入政府采购的,得按政府采购的规定办吧;报销之后,相关机构总要核查发票吧。彭应龙随便买什么东西都能报销,只能反证所有的程序都失守了。

需要厘清的是,家用全都用公款报销,不是指公家的油那么简单,而是严重的腐败行为。比如,海南儋州原市委常委、秘书长权晓辉利用职务便利,将公款报销作为敛财手段,其在儋州市任职4年多,公款消费报销共计404.94万元,仅2012年10月26日至29日的4天时间,就报销了6.7万元的住宿费和8.6万元的餐费。如此敛财,难道只能简单认为这是占国家便宜?

显然,如果只盯着彭应龙报销款项多,而不追问他为何能够顺利报销,如果只看到漏洞很大,却不想到如何堵住漏洞,那么逮住一个彭应龙,还会有后来者。对彭应龙们当然应该依法严惩,但有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不少一把手说不二,权力极大,想报销什么就报销什么,与所受监督不到位或根本就没有监督有关。正因如此,这些官员很任性,得寸进尺,欲壑难填。说到底,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必然滋生腐败。

## “强扣工资”凸显义务植树困境

张贵峰

甘肃临洮是六盘山片区贫困县之一,这里的机关干部、事业单位人员收入并不算高,但近年来,每年春天都会有一个月,这些“吃财政饭”的工作人员的工资,会以绿化费名义,被扣掉10%用于植树造林。人均400元左右,三年来,这笔扣款累计达1380万元。(4月3日央视)

以绿化费名义,每年强扣公职人员一个月10%工资用于植树,这种做法显然并不合理合法。虽然1982年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曾规定,可以“收缴一定数额的绿化费”,但2013年6月财政部下发通知,自2013年8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绿化费”等3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这种背景下,临洮县仍要求缴纳早已被明令取消的“绿化费”,既“于法无据”,也明显有违中央政令。另一方面,公务员法规定“任何机关不得扣减或者拖欠公务员的工资”,而这种强扣工资做法,侵犯了公职人员受法律保障的工资权利。这也就是说,“强扣工资植树”实际上涉嫌双重违法,既涉嫌“有令不行”,也涉嫌“有禁不止”。

当然,在强调“强扣工资植树”违法性的同时,又应该看到临洮旨在推动当地“植树绿化”的初衷用心,原本是没有问题的。诚如当地官员指出的,“我们县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从心里边来说,实实在在想把我们的绿化搞上去,苗木的绿化率提高。”而据了解,“临洮县扣的这笔绿化费确实用在了雇人植树造林上”。

于是,上述这些现实困难和问题,客观上提醒我们,34年前制定的义务植树实施办法以及由此形成的全民义务植树制度,确实存在许多显得与时代脱节的操作性问题。比如,在目前社会现实环境下,像“每人每年植树3至5棵”这样简单的数字指标,还有多大的现实操作性?再如,实施办法规定,义务植树主要由“各单位”组织实施,但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公民与单位的那种依附关系早已不复存在,“单位实施”如何实现?更重要的是,现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选择树种、种植树苗、养护树木等一系列专业问题,不可能依靠各行各业的人来完成。

“全民义务植树”如何与这种社会分工更好地兼容协调,政府如何履行植树造林美化环境的职责,值得人们深思。